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 教育侵略活动 资料简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 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

李清悚 顾岳中

上海教育出版社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
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

李清悚 顾岳中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75,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700 本

统一书号: 7150·2682 定价: 0.31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基督教在华教育机构在上海的侵略活动	3
一 基督教传教士的全国性会议和教育侵略的阴谋活动	3
二 “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和“中国教育会”的组织活动	5
三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成立和演变	10
第二章 中国人民反对教会教育运动	16
一 反对教会教育运动和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16
二 教会学校立案的风波	20
第三章 外国教会在上海举办的高等教育	31
一 各教会高等学校的创办经过	31
二 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	49
三 教会大学的组织机构	51
四 教会大学的经济状况	53
五 教会大学的统治手段	54
六 教会大学的特殊目的	58
七 教会大学的内外关系	60
第四章 外国教会在上海举办的普通教育	62

一	外国教会举办中小学的概况·····	62
二	教会中小学的内幕及其侵略本质的剖视·····	68
第五章	外国教会在上海举办的“慈幼教育”·····	97
一	“慈幼教育”的概况·····	97
二	天主教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剖视·····	100
三	基督教爱育学堂剖视·····	106
第六章	帝国主义利用“租界”进行教育侵略·····	108
一	“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教育侵略活动·····	108
二	“法租界”公董局的教育侵略活动·····	111

引 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军事、经济上对我国不断进行侵略、掠夺的同时，又派遣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陆续来到我国各通商口岸，并以上海为基地，传布宗教和从事文化教育等侵略活动。这种侵略活动后来又扩展到非通商口岸及我国内地。

天主教教皇于 1842 年派遣南格禄、艾方济、李秀芳三个传教士来到我国上海；到了 1846 年，各国天主教教会相继派出传教士来我国，设堂传教，并在上海的徐家汇设立总部，陆续建立起一系列文化教育侵略活动的机构。从此，来我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日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至 1900 年有 886 人；1910 年 1,391 人；1920 年 1,364 人；1930 年 2,068 人。1932 年时派遣在全亚洲的天主教西方传教士共 4,058 人，而在中国的占半数以上。到了 1949 年，天主教在我国的传教士达 5,346 人，其中 515 人在上海，占总人数近十分之一。

基督教来我国的传教士，自马理逊于 1807 年窜入广州起到 1840 年，只有 20 人，到了 1853 年增加到 618 人，1889 年 1,296 人。1907 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百年纪念大会时，已达到 3,833 人。人数最多的 1926 年，曾达到 8,325 人。

天主教来华的各种教会团体，都是修士团体，属于天主教唯一的公教教会，奉罗马梵蒂冈教廷为首脑，不分宗派。但这类团体的名目繁多，自1842年来到中国的耶稣会起，到1933年圣母心子会止，达三十余种之多；另外尚有八十多个女修会，诸如仁爱会、门斯德圣母始孕无玷会、耶稣孝女会、善牧会等。

基督教与天主教不同，它宗派林立，并在上海建立了许多全国性组织，大致可分为六类：(1)基督教各宗派各公会本身的全国性联合机构；(2)全国基督教教会的联合机构；(3)基督教部分公会联合会联合成立的新的教会组织；(4)基督教教会的事业团体的全国性组织；(5)基督教各项特殊团体的全国性机构；(6)基督教所办的事业机构的总部。其中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前身名中华续行委办会)和中华基督教会，在很长时期内统帅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差会的宗教活动，控制着他们所办的各种文化教育事业团体对上海进行的文化教育侵略活动。

基督教的传教组织通称为教会，西方传教士被派遣到我国传教的各宗派的团体，如美以美会、圣公会等，称为“差会”。而差会在本国属于各自的教会。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来华教会团体共有圣公会、浸礼会、公理会、路德会、卫理会、长老会、内地会，以及其它杂牌教会等几大宗派，每派又各拥有差会。^①

① 参考《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第9期。

第 一 章

基督教在华教育机构在上海的侵略活动

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和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教育侵略，其目的是一致的，但活动的方式和手法有所不同。天主教在华的活动注重于宗教宣传，同时举办一些文化教育的设施，以中国的中下层人民为主要宣传对象。天主教接受梵蒂冈教皇的统治，它的在华主教有无上权威。基督教是反抗罗马天主教而产生的新教，不受教皇的统治。它本身宗派众多，在华的活动除宗教以外，举办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多，它重视对中国社会上层人物的工作，提出所谓培养中国的“领袖人物”。由于基督教所办文教事业比较多，全国性的文教侵略机构大多数也设在上海，因此基督教对上海的文化教育侵略活动，往往又影响全中国。而中国人民的反对教会教育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都是针对基督教而发起的。因此本章以基督教为例，进行揭露、分析和批判。

一 基督教传教士的全国性会议和教育侵略的阴谋活动

1877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

议，这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全面侵略活动的开始。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传教士代表 126 人，以及名誉会员 16 人，共 142 人。这些人分别代表长老会、圣公会、公理会、浸礼会、监理会、路德会等六大宗派。其中美国 72 名，英国 49 名，德国 1 名，其他国家 4 名。这表明它是一个以美国传教士为主，由美英两国操纵的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美国传教士在会中最为活跃，尤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为最突出，几乎左右了那次大会。狄考文批评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是“错误”的。因为，在此之前，来华传教士所办的教育，都是中等以下程度的学校，其作用也只限于让入学的学生读圣经和学习一些基督教教义，使他们有能力钻研教义，加深信仰，仅仅是一项训练教民的工作。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因此，他在会上呼吁，要求立即扭转这种“错误”倾向，并指出传教士进行教育活动有五项重要性：

- (1) 它能供给有效能的和可靠的土著牧师；
- (2) 它能供给教会学校的教师，通过他们将西方优越的教育介绍到中国；
- (3) 它能供给一些人去领导、介绍西方文化科学和艺术到中国；
- (4) 它是培养中国上层阶级的最好工具；
- (5) 它能使本地教会自立。

狄考文接着又提出了旨在使教外青年受了教会教育后能倾心入教，倾慕西方“文明”，改变旧有的“异教”思想，最后达到奴化思想的目的。与此同时，狄考文又提出了一个更为毒

辣的阴谋，就是通过教会教育培养一批将来有希望掌握中国政权的上层人物，并通过他们影响中国，进而统治中国，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狄考文的主张使到会的传教士们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这是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后有组织地进行教育侵略活动的开始。

二 “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和“中国教育会”的组织活动

“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的组成成员有：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黎力基、傅兰雅等。韦廉臣担任主席，傅兰雅担任总编辑。韦廉臣是伦敦传道会教士，1855年来中国，曾创“广学会”，提倡文字布道。傅兰雅也是英国传教士，来上海后被江南制造局聘为编译。他建议将教科书委托江南制造局印刷所印刷。大会接受了他的意见。因此，除推他担任总编辑外，又担任名誉会计。根据他的意图，编了许多教科书，涉及学科的范围也很广。不仅包括宗教和伦理方面，也涉及历史、国际法、哲学、自然科学等。他自己也编写了53篇有关自然科学的文章。当时唯一参加编辑工作的中国人是颜永京牧师，他译了斯宾塞著的《教育论》和编绘了一张东西两半球的地图。1887年在上海还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和普通知识宣传会”，也译作“同文书会”，就是后来的“基督教文社”，中国名称一直译为“广学会”，也编印了不少教科书。

自“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成立至广学会的创办，由狄考文、潘慎文、傅兰雅、李提摩太、丁韪良、林乐知、莫安仁等所编的宗教教学用书，有《教会三字经》、《耶稣事略五字经》等，还

编了高小用的《福音史记课本》、《旧约史记课本》等。其主要内容是灌输宗教迷信，用以造就帝国主义的顺民——“教民”。以《教会三字经》为例，书中说：“世上物，皆神造……既造物，始造人……耶稣者，神之子……若不信，难得救，身死后，罚必至。……爱众人，如爱己，待敌人，亦以礼”等。此外，他们也编译了不少数理化教本，如《笔算数学》、《形学备旨》、《代数备旨》、《三角数理》、《数学理》、《代数术》、《格致须知》、《八线备旨》、《重学》、《八线拾级》、《勾股题镜》、《形学序例》、《形学拾级》、《代形合参》、《格致读本》、《物理引蒙》、《化学新编》、《光学揭要》、《热学揭要》、《电学纪要》、《最新电磁学》等；天文地理方面的教本，如《谈天》、《天文图说》、《天文揭要》、《天文略介》、《地理志略》、《地理全志》、《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列国地说》、《训蒙地理志》、《地文学教本》、《最新地文图志》、《小学地理课本》、《地志学入门》、《地理初级问答》、《人类地理学》等；体育、生物、卫生课本，如《生命世界》、《动物浅说》、《最新中学教科动物学》、《万物一览》、《海族学》、《昆虫学》、《种植学》、《应用卫生学》、《生物卫生学》、《初级卫生讲义》、《生理卫生学》、《体育图说》等；另有中外历史教本，如《中国纲鉴撮要》、《泰西十八国史撮要》、《印度史揽要》、《大英治理印度新政考》、《五洲史略》、《近世史略》、《法国最新进步史》、《大英十九世纪新史撮要》、《俄国近代史》、《新译英吉利史》等。他们认为，要达到侵略目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把它放进学校教科书里去”（韦廉臣引用在印度的传教士默多奚语）。他们所编课本除了一部分是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外，大部分内容旨在宣扬宗教，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

对我国进行歪曲和贬谪,使学生读后产生崇洋和自卑之感。

1890年基督教传教士召开第二次全国性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传教士利用教育作为侵略工具的重点。又是这个狄考文,发表了用心极为险恶的讲话。他说:“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教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而是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上及在社会中有势力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他又说:“不论在那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都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传教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使他在他的一生中,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枝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这就中国来说,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①狄考文的论调得到了大会的支持。至此,原来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已不适应新任务的需要,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停办,另行组成一个“中国教育会”。

“中国教育会”的办事机构由出席1890年大会的445个传教士推出37人组成。大会又议定在该会领导下,成立一个出版委员会,以供应教会学校的教科书,并接收“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的书籍和其他财产。

按“中国教育会”组织条例第二条规定:该会的目的,旨在

① 《在华新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记录》458—493页。

促进中国教育会的利益和增加从事于教学工作人员兄弟般的合作。该会的任务是：(1)编辑“适用”的教科书，应教会学校的需要；(2)谋教授上的互助；(3)探求和解决中国的一般教育问题。1893年，在第一届“中国教育会”上，提出了什么要“打破中国人的骄傲和去掉中国人的惰性”，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文明”。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这次大会上狂妄地说：“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无论在宗教、道德、组织和技术各方面都是不能相容的”。甚至叫嚣将中国旧有的美术，如音乐、图画等，也要连根拔掉或彻底地改造。他号召到会的人“要使基督教文化来战胜中国固有的文化”。①

传教士们虽然基本上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妄图以基督教来“征服”儒教，“战胜中国”，但是他们又不排斥儒家思想中某些落后的、于他们侵略有用的部分。例如，他们吸收了孔子哲学思想中关于“仁德”、“忠恕”等的道德学说，企图以此与帝国主义的宗教教义结成“文化同盟”，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使之接受帝国主义的摆布。李提摩太曾说：“中国最重五常唯仁为首，与西教之爱人如己，同出一源”②。林乐知也说：“天之所重者人，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尚者爱，爱之所包者中西一家。中西一家者，不外一和。”③

当然，这些传教士们在“文化同盟”中，不会忘记“西教”的“优越性”以及它的“盟主”的地位。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一文

① 花之安：《中国基督教教育问题》。

② 李提摩太：《新政策》，见《万国公报》第87卷。

③ 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

中，曾把中国的“旧学”与帝国主义的“新学”比作一辆马车上的“双轮”，以相辅相成。但他又认为车的走动只靠双轮是不行的，还必须“牵以骏马”，而“骏马”必须由他们来驾驭和控制。因此，他曾恬不知耻地说，中国要变法维新，必须把中国的政治、交通、经济、宣传、教育等大权都交给他们管理。

“中国教育会”及其附设的“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参事会”成立以后，教会学校有了显著的发展，并逐渐形成由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个完整的教会教育系统。据统计，基督教教会普通学校的学生，1905年总数为57,683人，1915年增加到169,797人，其中小学以上的学生占28.3%。^①

教会大学也是在这一时期和前不久创办起来的。尤其所谓“名牌大学”，都在这一时期改组建立。

教会学校所以能在这一阶段肆意发展，并形成一個与中国教育系统相对立而并存的教会教育系统，除了帝国主义传教士的蓄谋之外，也是与清朝卖国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媚外、惧外政策分不开的。1906年清政府学部咨告各省督抚：“外人在内地开设之学校，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给予奖励”。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的公告中曾说：“只要教会学校请求考核承认，政府以宽大为怀，不分中外，一视同仁，准予依照私立学校的手续办理。”^②这便为外国传教士兴办教会学校大开了方便之门。

① 《中华基督教教会年鉴》第4期(1915年)。

② 参考《中国教育年鉴》第一辑。

三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成立和演变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是由“中国教育会”改组成立的。1902年后,教会学校发展很快,“中国教育会”的会员人数也日见增多,会务不断扩大。因为会员众多,又散居在各地,集合比较困难。于是在1905年后,逐渐在各地出现地方的教育分会。最早成立的是1905年的“福建教育会”。其次是1907年四川成立的“华西基督教教育联合会”。后来又有1909年成立的“广东教育会”。因此,1909年“中国教育会”第六次年会议决,凡是各地所设地区教育会将章程送到上海“中国教育会”的,由该会审查合格,承认为分会。到1911年,各地分会相继成立,上海的“中国教育会”感到在组织上和职权行使上,都有重新改组的必要;同时,当时中国已形成一个教育系统,作为教会教育的一个组织,继续沿用“中国教育会”的名称自觉不妥。因此,改称为“全国基督教教育会”,以表示和中国政府所办教育的区别。从此,该会便成为基督教欧美传教士对我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一个总指挥所。

1915年该会又改称“中华基督教教育会”(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教育会法时,因该会名实不符,又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聘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贾腓力为总干事。贾腓力担任总干事后,大力扩张各地的教育会。“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在我国各地的分会迅速发展为8处,后来增加到10处,除甘肃、新疆、云南、贵州附属于附近地区外,各地建立的分会华东,华南,华西,华中,直隶,山西,福建,河南,湖南,东北三省,山东。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成立后，英美帝国主义的教会国外宣教机关“北美国外传教会议”，派了一个调查团来华，借调查教会教育为名，为在华的教会团体出谋划策，企图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教会教育的规模和势力。

1921年2月，以美国芝加哥大学前校长巴敦为团长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调查团”来华。英国的“大不列颠外国传教协会”也插手加入了调查团工作。该调查团团员中有美籍13人(其中贾腓力、罗炳生、司徒雷登等5人是已在中国的美籍传教士)，英籍3人(其中2人是已在中国的传教士)，中国3人(都是留美学生，他们实际没有参加活动)。该调查团从1921年9月13日起到1922年1月24日止，前后活动4个月21天。调查团分两路进行，一路从北京出发，到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和扬子江下游各处；一路到山东、上海、香港、广州、汕头、厦门、福州等处。11月末都回到上海，编成一册报告书：《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该调查团的经费主要由美国垄断资本家财团洛克菲勒基金会供给，一部分由英美等国的教会资助。

“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根据调查团的统计，当时差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

幼儿园	139所	学生	4,244人
小学	6,599所	学生	184,481人
中学	291所	学生	15,213人
师范	48所	学生	612人
大学	16所	学生	2,017人

法 学 院	1 所	学 生	27 人
医 学 院	10 所	学 生	563 人
护 士 学 校	106 所	学 生	1,380 人
盲 童 学 校	29 所	学 生	794 人
聋 哑 学 校	5 所	学 生	60 人
孤 儿 院	25 所	学 生	1,733 人
圣 经 学 校	100 所	学 生	2,659 人
神 学 院	13 所	学 生	391 人
共 计	7,382 所	学 生	214,174 人

(2) 他们认为要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只靠教会学校是不行的，于是就想把另一只魔爪伸向中国人办的公私立学校中去。如报告书中所说：“基督教教育既不能占教育活动之全体，又不能举办其一切可以举办之教育事业，故当与政府教育相提携。此种提携之方法，即在一校之中分任一部分之职务，或养成教师以供政府学校之用。或为对于国立或其他非基督学校之学生施行一种道德上与宗教上的影响”。^①此外，他们还注意到成人教育。报告书中说：“欲充分发展基督教社会，并欲解决中国一极重要之问题，则成人教育，亦不得不为适当之设备。”^②

(3) 他们不仅要把全国各级各类的教会学校统一起来，建成一个独立的教育系统，而且有一个全国性学校分布计划，设置一个自成系统的教育行政机构，指挥和管理教会学校。报

①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译本第 319 页。

② 同上。